

核电的承诺

Steve Kidd

核工业人员经常有这样一种错觉：他们的行业是唯一一个受到强烈反对者攻击的行业，因而产生一种孤立和极度自我保护的心理。其实远非如此——目前，任何工业部门都无法轻易逃脱公众舆论。在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下，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必须证明他们的活动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是正当的。目前在这方面的假设基本上是“未被证明清白前皆有罪”。但是情况真的如此糟糕吗？为驾驭国家和国际舆论所付出的努力真的值得吗？答案可能是不。

如果我们看一看美国，就会清楚地知道，公众对核电认识的显著提高，源于近年来美国104座反应堆优良的运行实绩。在适当考虑环境的情况下，安全地生产出大量廉价的电力，远远地比任何奇特的沟通交流策略更有效。只有当运行上出现差错时，公众才会开始关注。2007年德国两座电厂发生的事件和日本发生的地震，证明有必要很好地进行舆论管理和“危机管理”。

事实上，直到最近，公众才对能源问题有了些许的兴趣。只有在危机隐约可见，例如灯要熄灭，价格飙升，加油泵前排长了队时，人们才感到不安，并对产业和政治家们施加压力。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能源相对平静的时期，因此今天大多数人对特殊燃料或国家战略没有太多强烈的、完善的看法。当然也可能是能源消费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深深地触动公众的意识。气候变化和潜在的全球变暖推动了环境运动，因为它们呈现的灾变情景越来越有可能发生。大多数敏感的人认识到，他们的忧虑基本上是毫无根据的，因为经济的发展通常使环境更加清洁。

客观地看待核电，公众思想上明显担心它与武器的联系，担心核工业民用方面产生的扩散，以及担心运行可能产生的辐射释放。尽管我们可以将大部分担忧归因于对风险低但影响大的事件的不合理评价，但这是核工业必须承认的事情。幸运的是，难以改变的顽固反核分子相对较少。许多人在一些时候不是非把能源问题想得很坏，也说明舆论会很容易受到这样那样的影响。

不幸的是，我们无法靠政治人物在核问题上表现出更多的领导作用。痛苦的经历告诉我们，即使是可能激起甚至很少部分选民情绪的问题，他们都情愿“脚踩两只船”，因为失去这些效忠的选民可能在激烈的竞选中起决定性作用。因此，他们依靠核心集团，往往被公众牵着鼻子走，而不是采取与公众相反的意见。然而，气候变化提供了一个理想机会，对核能只是存有浅浅忧虑的人可以用新眼光审视核能。把核能作为一种绿色、友好的技术提出来，将需要时间，但核能几乎不释放温室气体的优点似乎正慢慢被理解。

核工业在舆论上遇到的许多问题可以归咎于过去的过失。发言人盛气凌人、高人一等地对听众讲话和不公开重要信息，是核工业费了好长时间才摆脱的遗留问题。目前社会本身已发生明显变化，核能必须与之相适应。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末期，国家纷纷出台规定，重视核能，相信科学应用能给大多数带来最大利益。但是自20世纪70年代后，自主化、怀疑科学和不顾共同利益主张个人权利，变得突出起来。核能无法坐视不顾，因为它依靠一定程度的国家参与（至少是在许可证审批、监管和废物管理方面建立其运行框

架)，但是最终要学会在充满竞争力的电力市场和私有制的环境中生存。

在今天的世界里赢得选民支持的最佳例子是在新设施规划这些具体问题上，而不是一般性的说服。实际上，舆论具有局部性，必须以针对局部性的方式加以处理。瑞典废物处置库的选址和芬兰第五座反应堆的建设足以证明，谨慎地与当地人合作能够带来巨大的利益。新设施建设的必要性必须首先有说服力地加以证明，然后使公众参与其全过程，并向公众提供明确的信息和磋商机会。在当地问题上，要把当地人当作专家来对待，他们最终应有对项目的最后否决权。必须看到有关公司关心的不只是利润，心里还装有当地和国家的利益。实际上，核设施会为今后许多年提供高薪和稳定的工作，对经济的广泛影响超出眼前的基本投资。

提供有关核能的明确、准确信息，一直是赢得选民支持的一个重要武器。虽然有识明显胜于无知，但这种方法也有一些局限性，不能指望能在短期内卓有成效。观察到的一个明显事实是，一些对核工业最强有力的批评家实际上是见闻广博之士。事实上，世界上办得最好的铀矿开采网站是反核组织WISE办的网站。因此，一定有更胜于事实的东西。信仰和价值观可以证明比雄厚的知识更重要。

如果你曾受情绪驱使接受一种论点（例如核能是邪恶的），你不太可能被反驳这种信念的事实所动摇——当然，反对者事实上可能也如此。转变嵌入人们心中多年的反核思想，要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考虑信息传播者和传播方式也很重要，因此倡导寻找可靠的第三方。在愤世嫉俗的人眼里，各行各业实质上都是利己主义的，“他们会问，难道不是吗”，但是像James Lovelock和Patrick Moore这样有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在毫无顾虑地说出支持核的重要性时，就太金贵了。但这仍是一场艰难的斗争，有些人是永远无法被说服的。事实上，在核能上体现了一些集团对现代世界的厌恶——科学应用、大国政府和大型组织的全球化生产。他们的傲慢

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早期一些误入歧途的核先驱者的骄傲自大，他们觉得他们在孤军拯救世界。

最后，还应认识到语言运用也很重要。我们今天在为过去的一些严厉错误承担罪过。你若是问人提到“核”最多会联想到哪些词，他们必然说是“炸弹”、“爆炸”或“战争”，而不是“电力”。换句话说（或更确切地说），要是核能一直被作为“裂变能”的话，让公众接受核能的困难无疑会小得多。因此，聪明的作法是当心你的不慎之言，因为人们在捕捉你的话外之意。

另一个明显例子是，草率地把所有反应堆背后的事物都称为“废物”，这样做是可以确保我们必须找到一个不把责任留给子孙后代的快速方案。或者换一种说法，称之为“乏燃料”，强调它的潜在经济价值，从而假借传给子孙后代的是重要资产而不是债务，把解决这个问题时间大大延长。在公众看来，其他像“快中子增殖反应堆”这样的核称谓就不太令人满意，令人想到险恶的战争狂人的形象，而像“球床式反应堆”这样的称谓似乎就比较温和。不一定要高薪引入形象顾问，但是对新称谓的舆论影响的一些想法最好应当考虑。

总之，经验教会我们，有多种方式我们可以用于促进核工业获得更有利的公众形象。然而，最重要的仍然是继续尽可能以最佳的方式运行现有的核电站，圆满地解决这个简单问题。除此之外，以当地为基础做好沟通交流工作和制订详细的危机管理计划也是必要的。✪

Steve Kidd是设在伦敦的世界核协会战略和研究理事。电子信箱：kidd@world-nuclear.org。

本文表达的观点不一定代表世界核协会或其会员公司的观点。他最近的书“堆芯问题——当今核能解析”已由《国际核工程》发表。网站：www.neimagazine.com。